

錢澄之全集之四

藏山閣集

湯華泉 校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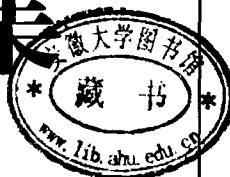


安徽古籍叢書

錢澄之全集之四

藏山閣集

湯華泉 校點



黃山書社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藏山閣集 / (清)錢澄之撰；湯華泉校點。－合肥：  
黃山書社，2004.12

(錢澄之全集之四)

(安徽古籍叢書第3輯 /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編審委員會編纂)

ISBN7-80707-057-9

I. 藏… II. ①錢… ②湯… III. ①古典詩歌 - 作  
品集 - 中國 - 清代 ②古典散文 - 作品集 - 中國 - 清代  
③錢澄之(1612-1693) - 書信集 IV. ①1214.92②K825.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092455 號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 資助  
本書出版得到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辦公室

## 藏山閣集

[清]錢澄之 撰

湯華泉 校點 馬君驛 審訂

\*

責任編輯 張紅一 諸偉奇

責任校對 張紅一 封面設計 國亮

黃山書社出版發行(合肥市金寨路 381 號)

合肥杏花印務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 18.25 字數 329 千字 印數 2000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707-057-9

定價 32.80 圓(精) 29.20 圓(平)

凡發現本書有印刷、裝訂錯誤，可直接向承印廠調換。

## 安徽古籍叢書編印緣起

我國歷史悠久，典籍豐富。我省地處南北之交，學術尤擅其盛。數千年來，哲學、史學、文學、藝術、語言、科技，作者輩出，著述如林，或自名一家，或蔚然成派，多為中華民族文化之菁華，有裨於社會主義文化之建設。允宜及時整理，以廣流傳。

粵自明清，以至近世，南北郡邑已有涇川叢書、龍眠叢書、貴池先哲遺書、南陵先哲遺書諸刻。一九三一年，復有安徽叢書之編刊，所收皆皖人著作，分期影印。出至第六期，以抗戰軍興而中止。盛業未竟，論者惜之。

今者，中央倡導整理古籍，我省領導對此尤為關心。原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委員會幾經商討，決定編纂安徽古籍叢書。編纂宗旨是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批判繼承，古為今用，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為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服務。最其體例，約有數端：一、所收皆為歷代皖人著作，時間一般以辛亥革命之前為限，根據內容，分類輯成。注意稿本、稀見本之搜輯與傳布。二、整理方式包括輯、校、標點和注釋、今譯。校勘，力求採用善本為底本，校以他書，或加補輯、編次。標點，採用新式標點。注釋，務求精確，但不作煩瑣考證。整理中，盡量吸收國內外研究的新成果。三、先秦、兩漢著作及文字、訓詁之書，皆用繁體字；其餘則多用簡體字，版皆豎排，以期一律。四、凡熱心於本叢書編印及捐資助刊者，得於書內題名。

## 整 理 說 明

這裏整理的藏山閣集二十四卷，底本是清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一九〇八）龍潭室編校排印本，包括藏山閣詩存十四卷、文存六卷、田間尺牘四卷。

藏山閣原集爲作者錢澄之所自編，二十卷，前詩後文，統一編卷，無尺牘。該集長期以鈔本流傳，名藏山閣存稿，所收作品絕大多數作于早年至南明行朝，止于永曆五年（清順治八年辛卯，一六五二）年底作者返回故鄉時。集中也收有少量返里後作品，爲深涉南明史事、深寓亡國哀痛之作。由此見藏山閣原集在時代斷限、內容性質上與後來編定的田間詩文集是有明顯區分的。

尺牘四卷是作者晚年信札存稿，爲諸集所未收或不及收。原曾以鈔本留存，龍潭室刊印藏山閣集時，將之與詩存、文存匯成一集，分別編卷。

### —

藏山閣詩存十四卷，分過江集、生還集、行朝集、失路吟、附錄行脚詩五個分集，依時序編排。

過江集二卷爲其早年作，有很多寫時事的作品。雜感（卷二）八首就是這種創作傾向的代表作，這組詩刺朝政，憂國事，訴民冤，悲憤激昂。晚清本集的收藏者、批點者蕭穆於該詩加批語云：「懷宗十七年國是顛舛，盡見數首之中，所謂言者無罪而聞者足戒也。」從這可以看出作者在創作的起始階段，就十

分注意反映社會的現實問題，十分注意表達自己對社會現實的思考和感受。

生還集七卷起于甲申（一六四四），止于永曆二年戊子（一六四八），這是明清之交政治變動最劇烈的五年，也是作者在政治上最活躍、身罹危難最多的五年。先是作者爲避黨禍亡命三吳，後遭乙酉之變，在三吳進行反清鬥爭。鬥爭失敗，作者南下福州，擁戴剛建立的隆武行朝。隆武敗，又奔向永曆行在。這幾年的政治變動、個人經歷，在這部詩集里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而各地義士的抗清活動以及作者在抗清鬥爭中百折不撓的剛毅精神，反映得尤爲突出。如寫江南兵事的悲憤詩、三吳兵起紀事答友人問（卷三）、哀江南（卷六）、續哀、廣哀（卷九），寫隆武時虔州（贛州）攻守的虔州即事（卷三）、虔州行（卷六）、虔州死節歌、虔州續歌（卷九），都至爲詳悉，匯爲波瀾壯闊的、前仆後繼的鬥爭場面。作者在哀江南中寫到江南死事者多達三十九人，其中有著名的抗清志士陳子龍、夏允彝、夏完淳、徐石麒、劉宗周、祁彪佳、黃淳耀、吳應箕，附見於各詩的又有數十人。讀小序知作者寫作的動機就是以詩存史，表彰先烈，詩中狀寫他們鬥爭的豪壯、臨難的從容，其英風豪氣數百年後還栩栩如生，這是漢民族不朽的正氣歌。悲憤詩寫震澤之難中抗清志士錢樣等人的英勇赴義，寫自己之妻及一子一女的死難，國破家亡，作者承受着人生最大的哀痛。在民族鬥爭的戰場上，作者已將自己的命運和抗清復明的事業緊緊聯繫在一起，置身家、生死於度外，表現了高度的自覺。後來他在隆武敗亡後於困守閩西的絕境中，病危幾死，絕糧幾死，遇亂幾死，而時刻以蘇武自勵，保髮全節，都是這種自覺性的突出表現。生還集占全部詩存的一半，內容十分豐富，它是作者在國變後創作的第一批，也是最重要的詩歌作品。

行朝集三卷止于永曆四年庚寅（一六五〇），是作者在永曆行朝任職三年詩作的結集。本集仍然注意對抗清戰事的反映，尤其注意湘贛戰事，寫有鼓舞人心的麻河捷（卷十）、章北院行（卷十二），也寫有戰局失利的悲湘潭、悲信豐、悲南昌（卷十）；但更多的則是以組詩形式反映行朝的政治運作、各地的戰守動態及自己的游處，如端州雜詩兩組二十五首（卷十）、梧州雜詩二十六首（卷十二）、廣州雜詩五首（卷十一）、桂林雜詩十首（卷十二），多批評朝政闕失、武臣驕橫，他所撰寫的野史所知錄、永曆紀年就大量引錄了這些詩作。唱酬詩也較前為多，這些作品也從一個側面映現了共赴國難的抗清志士的精神風貌，為明季一些著名的歷史人物如翟式耜、張同敞、方以智、金堡等人留下了一些剪影。

永曆四年庚寅冬，廣州、桂林相繼被清兵攻破，永曆帝由梧州西遷，由於兵亂道梗，作者與行朝失散，從此他真正成了亡國子遺。一卷失路吟就是寫於此時至次年返里之前。這卷詩有不少是悼念此時殉難的師友，寫得至為沉痛。本卷的行路難是以六十四首的篇幅寫其返里途中的「艱危徧歷」（本詩小序）。這組詩寫他如何逃難於粵西、粵東，徘徊於嶺南、嶺北，如何避兵、避「賊」、避「物色者」，如何「被掠」、「被縛」、「失子」、「僕散」「臥病」「米鹽絕」，寫盡了一個抗清義士窮途末路的艱難萬狀，同時也表現了他在精神上的痛苦絕望。這組詩可以與生還集一些篇章對讀，「生還」的慶幸已不見了，有的只是「黑風一夜三山失，却望滄波痛哭回」（行路難之四十一）的幻滅。

最后附錄的行脚詩一卷寫於返里之後的次年壬辰（順治九年，一六五二），作者仿唐宋以來僧人山居詩格調，自述「往來江上，為行脚僧」生涯，十分悲苦。組詩三十首盡是歌哭之辭，途窮之歎，也或隱或

顯地表達他懷念前朝、回憶「蠻方」同僚、後悔歸來的心情。這樣的作品很能引起一些遺民的共鳴，就在這卷詩寫成之後不久，作者在蕪湖的「故人」即予以板刻印行（見錢飲光先生年譜），後來錢謙益又悉數錄入他的吾矣集。可以說這卷詩是傳遞了不甘歸順的遺民的心聲。

這些就是藏山閣詩存的主要內容及寫作背景。作者在生還集自序中說：該集寫於國難之際，「其間遭遇之坎壈，行役之崎嶇，以至山川之勝概，風俗之殊態，天時人事之變移，一覽可見。披斯集者，以作予年譜可也。詩史云乎哉！」作者雖以謙詞出之，實際十四卷詩存正起到年譜和詩史的作用。他在所知錄例言中又說：「某生平好吟，每有感觸，輒託諸篇章。閩中舟車之暇，亦間爲之，粵則……每有記事，必繫以詩，或無記而但有詩，或記不能詳而詩轉詳者。」詩存中一千又五六首詩，皆是明清易代之際社會狀況的真實反映，那個時代所留存下來的詩作真正可稱爲詩史的，恐怕也只有這一部，即如和錢澄之年輩相若、經歷相似、且有過從的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方以智等並沒有留存多少這樣的詩作。諸集俱在，可以比勘。

藏山閣詩存還有些「山川勝概」「風俗殊態」之作，閩江竹枝詞十首、南海竹枝詞等風土詩以及桂林山水諸篇不少是前人未曾歌詠的。作者在亡命武水、困守閩山的幾年還寫了一些很有農家風味的田園詩，這與他歸里之後的田園之作不無聯係。在本集的早期以及後期還寫有不少思親、懷鄉、懷友、悼亡之作，亦皆深摯沉痛，別灑家國傷心之淚。

錢澄之詩名早著，諸體俱擅。五言古詩多爲紀事、紀行之作，如越東起兵、閩嶠流離諸作，有數十韵

至近百韵者，具見剪裁得體，描寫生動，細節畢肖。七言歌行諸篇多能大氣包舉，開闔自如，筆力雄健，頓挫抑揚。作者用此體頌戰功，悼忠烈，具有一種蕩人心魄的力量；刺時政，抒憤懣，能引發讀者强烈的共鳴。集中最多的是近體律絕，而又以連章體的律絕為多。為了加大容量，加強情感的抒發，或者為便於紀人、紀事，作者往往將律詩、絕句組詩化，常有二十首、三十首，甚至長達六十多首者，顯現出才力的充沛，構思的精熟。無論從格律、辭采，還是從意象、情韵上品評，集中的這些近體詩多數應是上乘之作。王夫之在永曆時與作者共事，曾讚揚「安慶錢秉鑑詩體整健」（見永曆實錄卷十七），主要當是指其近體詩作。這是符合錢澄之不少近體詩風格的。當然這只是一種描述，而就七律來說，又可以從多個側面概括其風格特征，如沉雄勁健、慷慨激越、沉鬱悲涼。如秋興六首更可以看出是杜律的遺響。前人有謂錢澄之詩出入香山、劍南，此論田間詩集則近之，而藏山閣詩存却顯承杜少陵一脉。作者也明言他的師承「唐則惟杜陵耳」（生還集自序）。移家白門紀事就酷肖老杜五古，其友人劉城為之刻梓作序，指出類北征等作，并說：「錢子幼光，身負逸才，其人與文得於少陵為多，夫豈惟人與文而已，遭時則然。」（蟬桐集卷二南徙百韵序。按南徙即移家原題）指出不僅詩學杜，人品也學杜，學杜又是時代使然。證之國變後「走浙閩，又自閩入粵，崎嶇絕徼，數從鋒鏑間」（徐乾學憺園集卷二十田間全集序）「踪迹略與少陵等」（田間尺牘卷四與沈聖符）的經歷，劉城之語信然。可以這麼說，藏山閣詩存是杜甫詩魂在異代化生出的豐碩成果。

## 二

藏山閣文存六卷，收文二十五篇，其中有一篇作於甲申前，題爲上皖撫鄭大中丞書，雖是爲地方大吏阻遏農民軍的劃策之作，但從中可以看出作者傑出的文才與分析力，以及對社會形勢、軍事策略的洞悉。原底本蕭穆眉批謂「胸中具數萬甲兵，實可見之施行」。作者作文的起點也是很高的。甲申以後的各篇或爲南明行朝謀劃抗清立國大計，用行政措施，或是批評朝政、總結失敗教訓，或傳寫義士業績，或載錄南渡史事，總而言之，都是圍繞抗清復明這條主線，思想內容與詩存是一致的。體裁上這些文章可分爲奏疏、論議、書信以及傳記、書序等幾類。

奏疏以擬上行在書，初至端州行在第一疏最爲精彩。前一篇是入閩不久奏上隆武帝的，在這篇奏疏中，作者透闢地分析了敵我雙方總的態勢，各地義軍的動向及利害關係，行在所權臣鄭氏的心性、長短，衡、贛、湘戰略位置及軍事意義，提出了「出閩、巡楚、蹕贛，協和魯國，固結鄭氏」的立國方略。這裏的分析是十分中肯的，有些還是帶有預見性的，如幾月後正如他的預料，南昌的金聲桓果然反正。只可惜行朝未采納作者的建言，未能及時「蹕贛」，而又與魯國失和，對鄭氏禍癥失策，最後導致唇亡齒寒，變生肘腋，迅速敗亡。後一篇是作者入粵之初奏上永曆帝的。當時江西、粵東相繼反正，清兵反撲包围南昌，義軍又圍清兵于贛州，雙方一時在江西相持，而南昌的攻守形勢則成爲左右整個戰局的關鍵。在此疏中作者籲請行朝急敕粵東兵援助江西，指出：「今日中興之大勢實在江西」，「救江西爲今日中興之

急着，舍贛州而徑下尤爲今日救江西之勝算也」。這篇奏疏是作者在江西戰地考察後作出的深具戰略眼光的軍事分析。當時各方力量的倚伏消長確如作者所言，「贛州未必降」也果爲作者所言中，粵東兵坐觀嶺上以待贛州之降，錯失戰機，以致一敗涂地。兩疏貫注了他的深謀熟慮、遠見卓識，是他懷抱經濟之策，在政治實踐上的光輝記錄。方苞稱他「以經濟自負，常思冒危難以立功名」（望溪文集卷十二田間先生墓表），應當說他的奔走國事，不僅是一種報國熱情，同時也顯現他具有堪當重任的才具。

論議的代表作南渡論、閩論、粵論，是三篇及時總結弘光、隆武覆亡及永曆朝江西、湖南、粵東潰敗教訓、切中肯綮的重要論文。後二論與前二疏相爲呼應：疏料事于先，論議事于後，更加證明他先前謀慮的縝密、正確。南渡論詳究敗亡之因，認爲阮大鋮是罪魁禍首，這雖是通論，但分析頗有特色。首先分析阮大鋮之惡重點不在「迹」，而在「心性」：寫他如何善于玩弄陰謀權術，隨風轉舵；寫他爲非作歹，「銜憤肆毒」而常常先發制人。這種「心理分析」深入地揭出了阮大鋮作惡的本質。其次，對阮大鋮的作用也不取「衆惡所歸」簡單化的對待，而又分析其客觀條件促成的因素：「夫亡國者，主也；亡主者，馬士英也；而令馬士英至此極者，阮大鋮也。推而論之，東林諸君子攻擊大鋮之已甚者，亦與有過焉。」這種分析很深刻，也合乎實情。文中還論斷：「亡南國者，一大鋮而已。其何以使大鋮銜憤肆毒以至於此哉？」以先帝之聖明爲門戶所持，致使用捨莫知適從，乃盡信小人以亡其國。」這又深入一層。這樣中肯、客觀地總結敗亡教訓，才能體現史論知往鑒今的作用。應當指出，作者在許多奏疏和論議中所表述的看法，多與後來許多史家的觀點相合。

書信，作者除一般談立國大計外，還有兩篇特別值得一敘。一為寓武水為家塞庵閣學復貝勒書，這是乙酉六月為退居嘉善的明朝大學士錢士升代寫的答復清酋勸降的書信。信中批駁了清酋所謂「清取天下取之于賊非取之于明」的謬論，引經據典，巧設譬喻，指出清人所為無信無義，名為入室驅盜，實乃盡「主人所有」而竊踞之，其行為與「大盜」無異。針鋒相對，義正辭嚴，十分有力。之前清酋亦曾以其意致書史可法，史公遣人報書，此書與史公書同樣激烈、勁直，不辱國格，可謂甲乙之際兩份重要文獻。另一為與汪辰初書，這是康熙二十年作者寫給他在南明行朝共事的老友的。這時距他歸里已三十多年，距永曆最後敗亡也已二十多年。在信中他仍然惓惓于南明文獻的搜索、保存，他認為永曆朝是那一段歷史正統所在：

主上以神宗之嫡孫，稱號十有六載，天命雖移，人心猶繫，雖僻處天隅，實正統所在也。異狐聚一日不遷，則正統一日在周；崖門舟一日不覆，則正統一日在宋。足下日紀正未可以偏方小史視之也。譬之故家遭難，第宅已為他人所有，子孫僅存，寄身籬廬，無知識者以宅內為主人，而有知識者終以籬廬中為主人嫡派之所在也。

此時何世，清朝已立國三十八年了，作者依然堅不認同。有意義的是兩年後其鄉人戴名世與余生書，亦為保存南明文獻而作，措辭如出一轍：

昔者宋之亡也，區區海島一隅，僅如彈丸黑子，不逾時而又已滅亡，而史猶得以備書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閩越，永曆之帝兩粵、帝滇黔，地方數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

義，豈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漸以滅沒……豈不可歎也哉！

（南山集卷五）

凜然大義，先後輝映。戴名世終於釀成南山集慘案，而錢澄之此信當時若被發現，參奏清廷，又會釀成怎樣的慘禍！爲盡忠明室而寫此信，又是冒怎樣的風險！

雜文、傳記、書序亦皆有關南明文獻。南渡三疑案、皖鬱事實又編入所知錄卷五、卷六，閩粵死事偶紀諸人事迹也多見載所知錄，吳廷尉鑒在傳、汪辰初文集序等篇皆有許多所知錄未及記載的內容，可補史闕。

藏山閣文章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多堪諷誦。奏疏、論議多氣魄雄大，立論堅確，論辯有力，鞭辟入里，還善用長句、排比句，有先聲奪人、蕩心攝魄之勢。作者說理除引經援史外，還善于設譬和描繪，增強形象性和直觀性。他深知建言之體以情感人的重要，所寫的奏疏、論議、書信，都富含濃鬱的情感。蕭穆評初至端州行在第一疏前一段爲「聲淚並集」，第二疏中間數語是「垂涕泣而道之」，可見一斑。記敘文看出作者有很高的敘述事件、描寫人物的技巧。幾篇人物傳記的人物形象頗爲鮮明、生動，作者善于通過典型細節，凸現其性格特征，如閩粵死事偶紀寫「決志于死而死者」的幾位，臨難情狀各各不同，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錢澄之的文才是很高的，在抗清復明的鬥爭中，他的文才也得到充分的展現，這部文存主要就是這段時期的作品。當然這時期有些未明顯帶入時事內容的論文如應制科考試寫作的光武論、戰勝廟堂論

等收進了田間文集，有些詔誥之作（作者曾一度入翰林專掌誥敕）也已散佚，但就是集中的這些作品已見出不同一般的成績了。這些作品多是在兵火間關、戎馬倥偬之中即刻寫成的，可見作者才思之敏捷、腹笥之豐厚。作詩，作者一直追步杜甫，而作文，這段時期則特別追慕蘇軾。他一再以蘇軾自比，曾說自己所寫的一些奏疏「似蘇表，行在諸公爭傳誦之」（見年譜）。論才氣、文情確實有與蘇軾相類處，尤其表現在論議的作品中。記敘作品又吸收了史傳、韓歐筆法，或簡潔，或曼衍，文隨體變，運作自如。應當說作者是明季文章的一大作手。昔人論桐城文派的源頭往往追溯錢澄之，蕭穆戴憂庵（名世）先生事略（敬孚類稿卷十）、葉德輝藏山閣存稿偶鈔跋（見附錄）皆如是說，這是符合實際的。

## 三

田間尺牘四卷，存信札一百余通，反映作者晚年生活的一些側面。中有一部分信札寫於諸集編成之後，最晚一封寫於去世當年，這對了解作者垂暮諸年情況是很寶貴的。最後一信說：「僕今年八十二矣，萬慮俱盡，惟筆墨未捐。」（與黃平子，卷三）見出作為一個文學家、學者其生命力的強健，因此他對自己的著述是十分珍視的。在與余仲廬這封信里說：「平生懷抱，毫發未申，惟少有著述，妄論足傳。四十年心血，盡于詩易兩書，頗發先儒所未發。微言久絕，識者甚難。值知己當道之日而不為傳，將誰為傳者？」（卷四）這裏提到兩部著作，在更多的信札里他講到包括詩文在內的所有著作都希望「當道」的友人資助刊刻、傳布。這樣的書信幾達四十封，見出作者那種熱切地追求立言傳世，「疾沒世而名不稱」

的著述精神。還有近三十封書信談到他的詩文寫作情況，這為已入集的詩文提供了背景資料，為未入集的詩文提供了鉤稽、查考的綫索。這一百多封書信的幾十位受者除了幾位為早年友人外，皆中晚年結交者，這對於了解作者的交游、研讀有關作品是大有裨益的。這些書信也反映這位前朝遺老生計的艱窘，心境的悲涼以及「客隱」中的種種況味。有些書信除了敘交情、陳心曲外，還有人情、世態的描繪，可作文學小品讀。

#### 四

在尺牘中作者多次提到藏山閣，談到它的特殊內容和特殊價值，謂是涉及「先代許多關係文字」，未能刻出，很是遺憾（與江在渭，卷一）。錢澄之易學、詩學等五種著作都是在七十九歲時由徐乾學、徐元文資助刻成于蘇州，就在這一年徐氏被劾奪職，「時局大變」，次年徐元文憂懼而死，由於經費和人事的原因，原先計劃續刻藏山閣，「竟不能竣也」（見與家枚，卷二）。類似這樣的話比如「有集六種，僅刻其五」，在七十九歲之後許多書信中都說過。到底此集是否刻出，在他的書信中又有幾處矛盾的說法，使得近人亦有認為此集曾已刊刻。細核其矛盾，有的顯為筆誤，有的是刊刻全集時的推測之詞，並無刻成之事。有清一代此書除清末有排印本外，從未見有印本傳世，清代所有書目也未曾著錄此書的刻本。此集的部分作品在作者生前曾板刻，行脚詩刻於蕪湖，生還集於永曆三年刻於廣州（見詩存卷十一有關詩及文存卷三生還集自序），這些單行本都未見流傳下來。崇禎甲申前的詩有不少還曾刻入

作者參與編選的桐邑社友詩集過江詩略，此集現有孤本藏上海圖書館。光緒以前流傳的藏山閣存稿只是鈔本，即便是鈔本作者生前歿後也沒有幾人看到過，只有錢謙益在吾炙集中錄存了其中詩六十七首，朱彝尊編明詩綜收詩二首，提到了藏山閣稿書名；其它同時及稍後的許多詩集如明遺民詩、僕衍集、詩觀、明詩別裁、歷朝詩約選都收有田間詩集中詩，有的多達一百首以上，但未及藏山閣。連著名的文獻學家全祖望及錢澄之鄉後輩方苞似乎也未見過此集（參見鮚埼集外編卷三十題田間先生墓表後）。錢澄之生前一再說過此集「涉避諱，不便印行」（與休寧令廖明府，尺牘卷三）、「未能行世」（與姜奉世，尺牘卷一），因此，他本人及其後人都十分注意本集的藏弃，輕不示人，躲過了康乾之世嚴酷的文字獄，這是此集及作者和家族的大幸。但從另一方面說，由於深藏秘鑄，鮮為人知，造成了後人對錢澄之早期創作的隔膜，如道咸間桐城邑人所編縱陽詩選、桐舊集收入了作者大量詩作，而早期作只從他集轉錄一二，這就帶來了一些對作者有失全面的評價。雖然近世有了排印本，或流布不廣，或囿于成見，學者還很少注意到早期作品，如晚晴簃詩匯竟未收入一首藏山閣詩。一些文學史、研究明清之交詩文創作的專著也對錢澄之早期創作關注不够，對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評價偏低。這種情況直至今天還未有很大改變。這樣說來對藏山閣集的整理出版確是必要。

## 五

這次整理藏山閣集，對各種傳本作了廣泛調查，除龍潭室排印本外，從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查到以

藏山閣集書名著錄的二十四卷鈔本有兩處，一是北京圖書館的明倫校本，一是安徽省圖書館的蕭穆鈔校本；以藏山閣存稿書名著錄的二十卷鈔本有四處，為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天津圖書館、浙江圖書館（原為劉承幹嘉業堂藏本，書名署為田間藏山閣，有跋）、湖南師範大學圖書館（原為葉德輝觀古堂藏本，有葉德輝跋）；又從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各訪得一部，還十分幸運地從錢澄之故里發現其七世侄孫錢向陽（冬生）道咸間鈔本。細勘這些傳本，弄清了各本情況及相互關係。北京圖書館所謂明倫校本其實只是排印本的過錄本，安徽省圖書館的藏本也並非蕭穆鈔本，而是璣樓居士汪德淵過錄的蕭穆藏本，此本保留了蕭穆所藏藏山閣存稿上的部分批註，調動了一些文章的分卷，又增鈔了蕭穆所藏尺牘四卷，合成藏山閣集（見璣樓居士跋），同時書頁上還有不少刪添勾乙的印刷記號，與排印本對照，標記處的文字改動一一相合，知此本是排印本的工作底本。上海圖書館藏本原為蕭穆藏本，據其跋語，此本原為錢澄之另一族裔白渠先生錢彝鈔本，蕭穆在此本上加了很多批語。另外幾部鈔本面貌大致相同，與白渠鈔本相較，小註顯少，知多出的小註特別是史地名物註當出自白渠之手。那幾部鈔本當接近錢澄之所編本原貌。

這次整理詩文部分用上海圖書館藏本（簡稱蕭本）、安徽省圖書館璣樓居士過錄本（簡稱原底本）進行對校，再以錢向陽鈔本（簡稱家鈔本）、天津圖書館藏本（簡稱津鈔本）參校。過江詩略存錢澄之早年作一百三十多首，詩存過江集二卷絕大多數詩皆在其中，文字相異處極多，作者自撰所知錄存詩一百一十多首，為閩粵間作，異文亦多，連同錢謙益吾炙集也都有重要校勘價值，亦作參校。寫校記時，前四種